读史札记

和通泊之战新研
——以黑龙江兵 为中心

张　建

雍正九年(1731)六月的和通泊(Khoton-nor)之战，清军损失逾万，是统一蒙古过程中最大的军事灾难(military disaster)[1]。关于这场战争，前辈学者已有所考证[2]，但主要依靠《实录》、《方略》，辅以《圣武记》、《啸亭杂录》，至于《八旗通志》和奏折史料，则多未采用，尚有讨论余地。本文试图以黑龙江兵丁为中心，采奏折等史料，对这一史事进行考证，以收抛砖引玉之效。

一、黑龙江鸟枪兵丁的秘密调发

雍正六年(1728)正月，新任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在圆明园陛辞时，奉雍正帝密谕，要其到任后，在布特哈(Butha)衙门属下索伦、达斡尔壮丁中挑选精干者2000名，练习鸟枪，预备调用。那苏图到任后，殷勤从事，于六月间将部队组建完毕，事见《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》(下称《全译》):

> 奴才陛辞之际奉旨：于布特哈索伦、达斡尔内挑选二千人，尔务必亲自会同塔尔岱验看，选精干历练者一半，精壮者一半，此二千人俱令操练鸟枪，二人合给兼人一名，其子弟或跟役自愿携带。本年八九月或来年草出时用之，俱未可料。准备停当，视朕旨一到，即由副都统塔尔岱率领前往。尔带银十万两，赏给派出官员二年俸银，兵丁一年钱粮，整治兵器。剩余银两如何措置之处，尔等详议具奏。其之行粮，照前派赴阿尔泰之例拨给。此事甚密，切勿声张。[3]

这次调兵，表面上看是清准休战后，清朝在北路轮戍制度的延续。当时双方虽停战，但清朝仍制定了一套制度以备不虞。包括颁给喀尔喀三部副将军敕印[4]，并在雍正二年(1724)推行轮戍制度，规定八旗军驻防扎克拜达里克(zakbaidalik)、茂岱察罕叟尔(Mudai tsagan sul)两城，并巡视卡伦，每四年轮戍一次。其中黑龙江兵被安排守护卡伦[5]。但由于雍正已密谋用兵准噶尔[6]，这一举措本质上是通过密折制度进行的战争准备[7]。除黑龙江外，盛京亦同时接到调兵的命令[8]。对黑龙江而言，一次调发数目如此众多的布特哈人丁，且全员装备鸟枪，是前所未有的大事件。

需要指出一个概念：布特哈衙门下的打牲索伦、达斡尔人丁不等同于黑龙江驻防[9]，从民族学角度，亦不能与今日鄂温克、达斡尔族完全对等[10]。清入关前收集入旗的黑龙江流域各部落民，在八旗组织中属于“佛满洲”(fo manJu)[11]，而在康熙年间，通过新编八旗满洲佐领进入旗下的索伦、达斡尔人，属于“依彻满洲”(iche manJu)[12]。布特哈衙门下的打牲人丁，在这时尚未编旗，并不隶八旗驻

[收稿日期] 2009-08-20
[作者简介] 张建(1980—)，男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社会史中心博士研究生；天津 300071

防[13]。如此大规模的单独调遣，实际上是打破惯例之举。之所以简选打牲人丁，是出于他们精于骑射，“挽强命中，是其所长”[14]，和黑龙江地域广阔，甲丁较少两个原因[15]。

然而雍正最终放弃了全由打牲人组成部队的想法，改为一半用黑龙江驻防中的索伦、达斡尔披甲，一半用打牲人丁[16]，此举可能是为了强化组织纪律。在人事安排上，以伯都讷（Bedune）副都统，齐齐哈尔驻防下依彻满洲人塔尔岱总管，并派侍卫西弥赖、双伯前往[17]。

为组建部队，一向节俭的雍正一次即拨银10万两，所需鸟枪2000支全部由兵部解送[18]。黑龙江地处边陲，受康雍时物价上涨因素影响较小。雍正六年秋，粮价每石仅银2钱2分，次年甚至跌至每石1钱8分[19]。所拨银两中，皇帝赏赐侍卫、官员二年俸禄，兵丁一年钱粮，合计银53970两。打牲布特哈人丁平时并无钱粮，而当时黑龙江披甲一月钱粮多少，亦无确切史料。那苏图奏折中提到兵丁每月行粮2两，按此数做粗略统计，每名被选拔上的兵丁会得到24两白银的赏赐，对兵丁而言可谓是一笔巨款[20]。从皇帝对这支部队的投入上，不难一窥其决意平定准噶尔的雄心。

二、出师北路与和通泊之战

雍正九年六月，鸟枪技艺已训练娴熟的黑龙江兵丁出师，经扎克拜达里克前往扎布韩（zabakhan）河畔的德尔苏托桂（drsutogoi）[21]。越冬后，按照轮戍制度的成例，部分兵丁被派往阿尔泰山的交通孔道，如布鲁尔（Burul）、布拉罕（Bulgun）路，守护卡伦[22]。余下者因号为精锐，被北路大帅傅尔丹留在大营，恃为左膀右臂[23]。

根据雍正帝最初的构想，北路清军应该在雍正九年初越过阿尔泰山，打击准噶尔本土。然而八年（1730）年底，西路清军的科舍图（kouchetou）之败打乱了旧有的战略部署。是役清军损失惨重，据奏折记载，阵亡、失踪汉蒙官兵3243名，而畜力损失尤巨，仅骆驼即折损14177头，西路军机动能力尽失[24]。此战后，雍正为增强力量，于九年二月再次从黑龙江征兵2000名，前往北路[25]。但还没等这支生力军赶到，和通泊之战便爆发了。

和通泊位于今蒙古国巴彦乌列盖（Bayan-Olgiy）省境内的阿尔泰山脉中，是一个淡水湖。附近的奇兰（kran）路，据卫星照片和军用地图显示，部分地段的高差达到+/-600m，根本不利于大部队的展开。双方之所以在此交战，已有定论，即傅尔丹中准部诱敌之计[26]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傅尔丹可能没有想到准噶尔会在这种地形条件下迅速集结多达30000人的军队[27]。昧于准噶尔俘虏的谎言，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）他率8000官兵深入准噶尔的军事经验[28]，以及地理条件，傅尔丹只投入清军11000人，其中黑龙江兵丁1000人[29]。

六月十八日，清军进至博克托（Bogdo）岭，由参赞大臣苏图、海兰、副都统岱豪、舒楞格统率的京旗官兵1000名先遭遇准噶尔军。据《圣武记》、《啸亭杂录》记载，清军甫一交锋，即兵败如山倒[30]。这一说法为前辈史家所采用。然而根据奏折史料显示：当前锋与敌遭遇后，傅尔丹“随派前锋统领丁寿领兵2000名，应援前来”，合兵进攻，“厄鲁特俱各零星四散”。这3000名清军立即后撤，与大营会合。六月二十日，清军“于和通呼尔哈地方交战一日至日落，数次败贼，夺占北山、西山”。可见清军此时并未落于下风[31]。

战局发生关键转折，是在六月二十一日。当日，傅尔丹感觉准军有备而来，移营后撤，“向和通呼尔哈淖尔返回近三十里”[32]。此时清军尚能保持阵形，并控制撤退道路两翼山头，有序撤退。但后卫定寿部被围困，引起战局变化，奏折载有当时后卫队中委署前锋章京金柱的口述，证实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，是导致后卫清军被围的原因：

> 大兵起程，走不多时，贼兵愈加增添前来，丁寿即率兵打仗，因时值天晚，丁寿随传令兵丁俱各下马，且战且走，前奔大将军营盘会兵。正走之间，忽然天阴下雨，风雹大作，彼此搅战一处。因地势不好，步行排列方营，攻取高阜之处，随登山头。贼兵将我兵四面围困……。[33]

阿尔泰山脉中气候变化无常，19世纪初英国

探险家阿特金森（Atkinson）也曾遭到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袭击，可为一旁证[34]。由于后卫清军兵力、弹药有限，在装备火器的准噶尔军围攻下，于次日全军覆没，定寿自尽[35]。

和通泊一带的奇兰路呈西北—东南走向，为掩护大营撤退，塔尔岱与归化城副都统马尔齐、衮布率归化城蒙古兵保护西山梁；东山梁则由西弥赖带领黑龙江兵丁守护。后卫军被分割包围后，西山梁亦遭到进攻，马尔齐阵亡，衮布投降，塔尔岱被大营救援而出[36]。

为何黑龙江兵丁驻守东山梁时，塔尔岱却在西山梁？这里固然存在临时调拨的可能，但笔者认为还要从旗制的角度寻找答案。在八旗驻防制度成熟后，每逢战事，各地驻防兵丁以旗纛颜色分列方位。《会典》载，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规定：各地驻防均使用上三旗纛。在此之前，纛色由统兵大员所属旗分决定[37]。驻防纛色的改变，实际上体现了顺治到雍正之间，旗主逐渐消失，皇权控制力加强的制度变化。但黑龙江驻防在康熙时便使用上三旗纛色，如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）出兵时，由京师颁给“羽林大纛”，实际上就是上三旗护军纛[38]；雍正四年（1726）派出轮戍兵时，也是使用上三旗纛[39]。至于雍正七年出兵时，黑龙江兵很可能是沿用前几次出兵的纛色。从乾隆朝定黑龙江纛色为正白旗来看，黑龙江兵的纛色可能是上三旗左翼两旗（镶黄、正白）旗色之一。这样，以镶黄旗的西弥赖，而非镶蓝旗的塔尔岱统率，并防守东山梁，就显得合乎旗制[40]。

相比西山梁的苦战，守护东山梁的黑龙江兵丁却不战而溃，从而使准军在合围定寿部，并夺取西山梁后，未付出多少代价便占领东山梁，得以纵向迂回包围清军，西弥赖自感罪责重大而自尽[41]。索伦兵的溃逃，无疑是这场战役的“胜负手”，清军自此满盘落索。奏折对其溃逃之因记载含糊，仅称“扎营不定”，“俱弃营帐，前往科布多城”[42]。惟《八旗通志》称“贼兵设伏山谷，枪炮猝发”[43]，考虑到准噶尔在以前瑞典炮兵士官列纳特（J G. Renat）为首的俄国俘虏帮助下，自行生产火炮[44]，且射程优于清军火炮[45]，故可将黑龙江兵丁的溃败归因为准噶尔“包沁”（Pūchin）投入战斗的缘故[46]。

对黑龙江兵丁的溃败，傅尔丹应负有一定责任，他将塔尔岱调往西山，致使黑龙江兵群龙无首。西弥赖虽身为副都统，与索伦、达斡尔兵相处四年之久，却在关键时刻无法控制部队，对比一年后额尔德尼召之战索伦兵的表现，可见塔尔岱个人对索伦兵的影响力确实无可替代[47]。此外打牲索伦、达斡尔兵丁涣散的战术纪律，也并未因与黑龙江驻防同胞共处而改观，索伦兵溃时“黑龙江佐领巴都马始虽劝阻索伦，后亦伙逃妄报”[48]，其涣散的表现反而影响到驻防甲兵，令人有出乎意料之感。

黑龙江兵面对准噶尔军突袭，不坚持奋战而溃散，不仅令清军丧失侧翼，导致大营被围，也给其它队伍树立了很坏的榜样。被围后，清军在营房周围掘壕固守，此时全军尚有8000余人，若能上下一心坚守或突围，不至于损失惨重。但清军组织复杂，各部不能有效协调的矛盾开始显现。二十三日夜，蒙古、绿营兵纷纷弃营，逃往科布多[49]。大营惟余八旗官兵4000余人，反而迸发了惊人的战斗力，连续打退准噶尔骑兵的冲击[50]。二十五日，苦等后援不至，清军集结方阵突围，以火器布列于外，卫护辎重，且战且走，三日间东行三百里，至哈尔哈纳河，弹药、箭矢用尽，已无法保持方阵，有马官兵护卫傅尔丹冲出，“塔公尔岱冒锋矢出，中枪穿胫，血殷征衫”[51]，其余高级官佐如副将军查弼纳、巴赛等俱战殁，陆续撤回科布多的清军，仅2000余人[52]。

余论：和通泊之战对黑龙江旗制造成的影响

和通泊之战对蒙古局势转变起到的重要意义，前辈学者已作详尽论述[53]。笔者仅就此役对黑龙江旗制带来的影响聊作叙述。作为导致清军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，黑龙江兵丁的低劣表现令对其寄予厚望的雍正帝痛心疾首。九年十一月，他在上谕中斥责傅尔丹“伊所恃者，惟数索伦耳。岂知首先溃散，几致伊于危殆者，即索伦乎”[54]。这种记忆甚至影响到乾隆帝，乾隆十四年（1749）上谕：“索伦兵……质性犷悍。曩时和通呼尔哈之战，彼即先

奔。”[55]由此可见黑龙江兵丁的溃败对和通泊之战产生的影响。

鉴于此战之失，雍正决定调整对打牲索伦、达斡尔人丁的管理方式，将其纳入八旗制度，强化军事职能。雍正十年（1732），正式将布特哈人丁编为“布特哈八旗”，在原有的血缘、地缘组织上编设108个佐领，每佐领人丁并不划一[56]。同年，清朝又从布特哈人丁下抽调3000丁，迁往呼伦贝尔地区驻防。相比布特哈八旗，他们无须承担贡貂等义务，更接近黑龙江驻防[57]。此前研究多认为这些举措是出于御俄的目的，但综合雍正十年前后，清准战争的局面来看，以上措施均可视为清朝借鉴和通泊之战的教训，在准噶尔侵入喀尔喀的局势下，对旗制作出的灵活调整，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雍正的改革精神。将索伦、达斡尔人丁陆续编旗，不仅扩充了黑龙江的兵源，使之逐渐军事化，而且为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到二十四年（1759）清朝统一天山南北打下了基础。

---

①关于军事灾难的研究，参 Eliot Cohen& John Gooch, Military Misfortunes The Anatomy of Failure in War. New York The Free Press, 1990, PP. 39—70

②戴逸、张世明：《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》（军事卷），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，255—259页；马大正、成崇德主编：《卫拉特蒙古史纲》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，107页；冯尔康：《雍正传》，三联书店1999年版，409页；左书锷：《雍正朝平准战争中的几个问题》，《青海民族学院学报》，1987年第2期，76—81、75页；张杰：《论清代靖边右副将军塔尔岱》，《黑龙江民族丛刊》2006年第4期，73—79页。

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：《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》（下简称《全译》）下册，黄山书社1998年版，1643—1644页。

④李毓澍：《外蒙政教制度考》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，9—10页。

⑤《全译》上册，802页。

⑥雍正五年（1727）便开始密谋统一准噶尔，参《雍正传》，403页。

⑦杨启樵：《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，152页。

⑧《全译》下册，1610页。

⑨柳泽明：《いわゆる「ブトハ八旗」の設立について》，《松村潤先生古稀記念清代史論叢》，汲古书院1994年版，110—116页。

⑩此处曾得到定宜庄前辈的指点，谨合十致谢。

⑪阿南惟敬：《清の太宗の黑龍江征討について》，《清初軍事史論考》，19—44页。

⑫楠木贤道：《康熙三〇年のダグール駐防佐領の編立》，《松村潤先生古稀記念清代史論叢》，77—93页。

⑬柳泽明：《清代黑龍江における八旗制の展開と民族の再編》，《歴史学研究》698卷第6号，10—12页。

⑭西清：《黑龙江外纪》卷4，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，134页。

⑮当时黑龙江将军辖区内，仅有黑龙江城（Sahaliyan ula）、齐齐哈尔（cicigar）、墨尔根（mergen）三城设有驻防。雍正四年，三城披甲、匠役合计5，376名。参《全译》下册，1360页。

⑯《全译》下册，1643页。

⑰《全译》下册，1643—1644页。

⑱《全译》下册，1643—1644页。

⑲《全译》下册，1662、1845页。

⑳实际上兵丁拿到的银两远低于此数，如制办盔甲时便从每人银两中扣除6两。见《全译》下册，1612页。

㉑《全译》下册，1865页。

㉒《全译》下册，1969—1970页。

㉓《清世宗实录》（二）卷112，雍正九年十一月甲子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488页。

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》(下简称《汇编》) 19册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1010页。

㉕《全译》下册，2025—2026页。

㉖戴逸、张世明：《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》（军事卷），256页。

㉗准噶尔军队数字，参《清内府八旗列传档案稿》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版，20页。

㉘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前编卷7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357册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，140页。

㉙《全译》下册，2191页。

㉚魏源：《圣武记》卷3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143页；昭梿：《啸亭杂录》卷3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60—63页。

㉛《全译》下册，2191页。

㉜《实录》载傅尔丹称此举是为诱敌，然而清军并未在和通泊建立坚固之预设阵地，诱敌之说似难成立。

考虑到阿尔泰山的崎岖地形，对准噶尔军队的集结与展开速度有一定的阻碍。《实录》记载二十日时，清军大营面对准噶尔军 20000余人的冲击。则清军在交锋数日后撤退的原因，应是准军集结完毕，加强攻势的结果。参见《清世宗实录》（二）卷 108，九年七月甲申，438页；《全译》下册，2191页。

㉝《汇编》20册，896页。

㉞阿特金森著，唐楠等译：《欧亚纪行》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3年版，107—109页。

㉟《钦定八旗通志》第 4册，卷 152，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2年版，2586页。

㊱《全译》下册，2191页。《实录》称马尔齐自尽，而奏折中塔尔岱称马尔齐是战死，因当时马尔齐与之同在西山梁，塔尔岱之言应可信，另一副都统布尔沙也证实马尔齐为战死。另《八旗通志初集》亦称马尔齐“冲杀数次，遂殁于阵”，则《实录》记载有误。参见《清世宗实录》卷 108，九年七月甲申，438页；《八旗通志初集》第 6册，卷 145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，3767页。

㊲(乾隆)《大清会典则例》卷 122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：《文津阁四库全书清史资料汇刊》史部 67册，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，142页。

㊳《全译》上册，799、884页。

㊴《全译》下册，1391页。

㊵塔尔岱之旗分，参张杰：《论清代靖边右副将军塔尔岱》，《黑龙江民族丛刊》2006年第 4期，76页。西弥赖旗分，见《八旗通志初集》第 6册，卷 145，3768页。八旗排列方位，参杜家骥：《清初八旗的排列次序及相关问题考察》，《满学研究》第 7辑，1—22页。另，此处曾得到杜家骥前辈的指点，谨合十致谢。

㊶《全译》下册，2191—2192页。

㊷《全译》下册，2161页。

㊸《八旗通志初集》第 6册，卷 145，3768页。

㊹约·弗·巴德利（John F. Baddeley）著，吴持哲、吴有刚译：《俄国·蒙古·中国》上卷，第 1册，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，350页。

㊺《汇编》21册，285—287页。

㊻“包沁”即托忒蒙古语“司炮者”之意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，参羽田明：《中央アジア史研究》，临川书店 1982年版，285—286页。

㊼张杰：《论清代靖边右副将军塔尔岱》，《黑龙江民族丛刊》2006年第 4期，75—77页。

㊽《清世宗实录》卷 108，雍正九年七月乙酉，中华书局 1986年版，440页。

㊾《全译》下册，2161页。

㊿《全译》下册，2162页。

þ 昭梿：5啸亭杂录6 卷 3，62页。

þ 5全译6 下册，2162页。

þ 兹拉特金（I. Y. Zlatkin）著，马曼丽译：5准噶尔汗国史6，商务印书馆 1980年，349) 350页；戴逸、张世明：5 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6（军事卷），256) 257页。

þ 5清世宗实录6 卷 112，雍正九年十一月甲子，488页。

þ 5清高宗实录6 卷 232，乾隆十四年正月甲寅，544页。

þ 刘小萌：5满族的社会与生活6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年版，233页。

þ 定宜庄：5清代八旗驻防研究6，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年版，92) 93页。